
September 2015

Historical Totality: The Plight of Re-enchantment: A Critical Review of Jameson's Major Code of Narrative Politics

Kaiyan Zh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Zhang, Kaiyan. 2015. "Historical Totality: The Plight of Re-enchantment: A Critical Review of Jameson's Major Code of Narrative Politic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5): pp.106-11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5/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总体历史观: 赋魅的困境

——詹姆逊叙事政治学主符码评析之六

张开焱

摘要: “总体性历史”是詹姆逊包括叙事政治阐释在内的文化政治阐释学的主符码之一, 这个主符码带给他许多犀利的洞见, 但也存在赋魅(神秘化)倾向。詹姆逊认为个体感性经验对于总体历史而言都是不真实的, 后者无法被任何个体所感知把握, 这就使他的理论存在明显的神秘化倾向和内在的悖论。同时, 在后现代语境中, 詹姆逊的总体历史观也遇到严峻的质疑和挑战。解决詹姆逊面临的困境, 不是彻底否定历史总体性的存在, 而是吸纳中西哲人有关智慧, 确认历史总体性的存在, 但同时更重视个体(此在)当下历史经验和认知的价值。确认所有个体对历史的认知(“此在之历史”)都指向和属于这个总体性历史, 但都不是这个总体性历史的全部而是部分构成, 都既有存在理由又有必然局限。

关键词: 詹姆逊; 总体历史观; 赋魅; 后现代; 困境; 宏大历史; 小型历史

作者简介: 张开焱,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 中文一级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中国古代文论学会、中国叙事学会理事, 湖北省文艺学学会副会长。专业方向为文艺学。电子邮箱: kaiyanzhang2000@aliyun.com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叙事形式政治潜素与政治意义及其生成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10BZW004]成果之一。

Title: Historical Totality: The Plight of Re-enchantment: A Critical Review of Jameson's Major Code of Narrative Politics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jor codes in Jameson'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ermeneutics, "the totality history," while yielding much insight, has a tendency of re-enchantment (mystification). Jameson thinks that the individual perceptual experience is not true for the totality history, while the totality history can not be recognized and grasped by any individual, so his theory has obvious mystification tendency and intrinsic paradox. Meantime, Jameson's totality history view also encounters severe query and challenge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Solving the plight Jameson faced is not to deny the existence of the historical totality, but to absorb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ers' wisdom to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historical totality, and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value of individual's prese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recognition. We should make sure that all the individual's recognition of history points to and belongs to this overall history, but just part of it, they all have reason to exist and also have their limits.

Keywords: Fredric Jameson; the Totality History; Re-enchantment; Post-modern; Plight; The grand history; The Small History

Author: Zhang Kaiyan is a professor at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435002,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 in literary studies. Email: kaiyanzhang2000@aliyun.com

众所周知,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叙事政治学分析的阐释主符码之一是“总体性历史”, 这个主符码既给他带来了丰富的洞见和开阔的视野, 但也招致了不少质疑。本文将对这个阐释主符码可能的困境进行论析, 并给出自己的解决思路。

——

《总体历史观: 祛魅的利器》^①一文对詹姆逊以“总体性历史”(The totality history)为主符码对叙事问题进行政治阐释做了概要的扫描, 这一扫描揭示了主符码对詹姆逊理论的重要性。正

是通过这一主符码提供的洞见,詹姆斯对三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审美和形式的赋魅(神秘化)进行了有力的祛魅(解神秘化),他从历史的高度揭示了被视为具有高度独立性、自律性和自治性的审美形式其实根本上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其中积淀着特定历史内涵,在具体叙事文本中,它们也承担着特定历史功能。它们所谓的独立性、自律性和自治性,在无意识之中一直在受着这种总体性历史操控。不仅是对于叙事的政治阐释,他对后现代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高屋建瓴的犀利透视,在相当程度上,也依赖于这个主符码带给他的锐利和洞见。

但在充分肯定“总体性历史”这个主符码对于詹姆斯给形式和审美祛魅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詹姆斯的论见也可能激发理论的质疑。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詹姆斯用“总体性历史”这个主符码给形式祛魅的同时,他事实上也在有意无意地给这个总体性历史赋魅。在他的论析中,包括叙事形式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历史的产物,历史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但却又是任何人都无法把握的。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中,他用“总体性历史”作为主符码解释一切叙事现象,但又说历史在任何文本中都是“缺场的原因”。在《认知的测绘》(*Cognitive Mapping*)中,他说任何个人的经验都无法感知这种总体性历史,这个总体性历史就时间和空间而言大大超过了任何个体的生活视域和感知视域,所以,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对它的全部经验,它在任何个体的经验中必然是缺场的。他以晚期资本主义为例说,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现实,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感觉到的,只能从理性的、科学认知的角度来把握。因此——[……]在这一环境里,我们可以说若个体经验可信,那它就不真实;若一个内容相同的科学或认知模式真实,那它就无法被个体经验所捕捉[……](349)。这就是说,总体性历史对于任何个体经验而言,都是一种无法感知和把握的神秘性存在,这明显存在将历史神秘化(赋魅)的问题。这个总体性历史可以用来解释任何文化现象、叙事现象,但却没有任何人可能对它全面了解和把握,它太神秘了。德里达也曾经指出詹姆斯有将历史神秘化的倾向,在后现代语境中,詹姆斯给总体性历史观赋魅的努力注定会引起质疑和争论,它可能存在许多问题。

詹姆斯认为,总体性历史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完全感知的,也无法在任何地方、任何文本中完全显现的。针对海登·怀特关于人们只能通过文本来了解历史,历史是无底游戏的历史观,詹姆斯也承认我们只能通过文本来了解历史,但他认为历史永远不是任何文本,历史在任何文本中永远是“缺场的原因”:“历史不是一个文本,不是一个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是一个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接近历史和现实本身的途径,必须通过对它事先文本化(textualization),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narrativizati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35)。这意味着任何文本叙事中的历史都不是历史的全部,我们也不能奢望通过任何文本获得历史的全部,它们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同时,我们要获得对历史的认知,又只能通过这些具有局部性的文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面临的困境。面对这个困境,詹姆斯的立场恰恰与怀特相反,他不是否定那个终极“底牌”的存在,而是确认那个作为最终“底牌”的、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其实是存在的,而且是先在于任何文本的,我们见到的一切关于它的文本叙述都是它的一部分,都是特定历史主体出于特定阐释符码对这个历史阐释的结果。詹姆斯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Marxism and Historicism*)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在他看来,历史是有“底”的,这个底没有任何人能完全把握,也不会以它全部、整体的形态呈现于任何人、任何文本之中,但我们所有对于历史的言说,都指向这个“底”,属于这个“底”的一部分。

詹姆斯与怀特的区别,笔者用自己的术语来表述就是这样的:如果将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和过程称为“元历史”,^②那以后所有关于这个历史事实和过程的叙述(也是阐释)都是特定历史学家基于特定阐释主符码对这个“元历史”的次编码,我们将最早对这个元历史叙述的文本称之为“一级编码”,以后的历史叙述都是建立在这个一级编码基础之上的二级编码、三级编码乃至N级编码。詹姆斯的观点意味着,在这个编码系列中,尽管作为“底牌”的那个“元历史”我们已经无法完全知道,但在逻辑上它确实存在,所有的历史编码都是在这个“元历史”基础之上产生的,都局部地表现着这个“元历史”,指向这个“元历史”。海登·怀特的历史观则基本否定了这个元

历史的作用和意义,它强调的是所有的历史编码都是建立在之前N级历史编码基础之上的重新叙述,这些重新叙述与原初发生的历史事件和过程的关联,是我们无法确认的。而詹姆斯则坚持这个元历史尽管在关于它的各级编码(历史文本)中都不能完全再现(在场),但各种历史叙事文本都指向这个“缺场”的元历史,因此,这是“有底的游戏”,这也是詹姆斯与怀特的区别所在。

詹姆斯的这个表述,是为了试图解决其总体性历史认识论困境。因为如果说历史具有总体性,那这个总体性历史是什么?在哪里?没有任何人对它有完整的经验和认知,所以,这个总体性历史在任何人、任何文本、任何场合中,都是“缺场的存在”。但既然所有人都无法感知和把握,又如何证明那个总体性历史存在呢?这是詹姆斯面临的二难困境。詹姆斯说历史总体性只能依赖理性和科学来把握,但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对于理性和科学能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和把握对象世界的传统认识是深深质疑的,这方面的理论学界早已熟知,此不赘复。

二

詹姆斯的“总体性历史”某种意义上带有早期海德格尔“存在”的特征:万有万全的“存在”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就其全部的意义而言,它不能被生存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的任何“此在”完全把握、感知、了解甚至言说。所有“此在”对于“存在”的理解、筹划、言说所建构的“此在之在”,都必然只是这个神秘“存在”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詹姆斯对总体性历史和具体历史叙事之间关系的表述结构和逻辑,基本与海德格尔对“存在”与“此在之在”的表述和逻辑相似。但海德格尔这种表述明显在神秘化那个终极性的“存在”,这既与这个哲学家神学院出生的背景有关(将神学中的“上帝”换成了他存在哲学中的“存在”),也与其理论困境有关。就后者而言,他面临的困境在西方是历史性的。在西方哲学史上,一切试图为世界万有找到一个终极的、唯一的统摄性因素的哲学,都不得不对这个终极统摄性因素进行神秘化处理,这从柏拉图的“理式”到中世纪神学的“上帝”,从康德的“物自体”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以贯之。可以说,一切哲学关于世

界的“宏大叙事”都会面临这种困境。詹姆斯关于总体性历史的表述,也明显存在这种困境,他将这个总体性历史有意无意地神秘化了。

但詹姆斯与海德格尔不一样的地方是明显的,海德格尔没有指证那个万全万有、包罗万象的终极性“存在”是什么,他也无法指证,因为他知道作为哲学家的他也只是一个时年有限的“此在”,因而和所有“此在”一样,他也无法言说和指证那个完全的“存在”(即使他言说和指证“存在”,最后能言说和指证的也只能是“此在之在”,而不是“存在”的全部),但詹姆斯对他的总体性历史的终极性因素作出了明确指认,那就是生产方式。在詹姆斯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不同生产方式的交替和并存构成的历史,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和特定生产方式有根本的联系。这才是詹姆斯整体历史观的核心要素。从叙事政治学角度讲,既然如詹姆斯所言,一切历史都是政治的,那么,与总体历史相关的生产方式就必定是政治的核心构成。所以詹姆斯明确地说《政治无意识》这本书“概述的政治无意识观念就是试图在客体内部重新为它(引者按:指生产方式)定位”(34)。因此,在詹姆斯那里文学艺术政治分析的终极目标也就是揭示特定的文学现象与特定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

应该说,詹姆斯将生产方式作为总体性框架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行的描述是有一定解释力的(但是否具有无限解释力存疑)。但如果生产方式是历史的终极性统摄力量,人类历史的一切方面都被这种力量渗透、影响和控制,为什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大多数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并不能经验到它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总体性历史如詹姆斯所说在当代社会人们生活的经验中普遍“缺场”?对此,詹姆斯的解释是,这个总体性因素就时间和空间而言大大超过了任何个体的生活视域和感知视域,所以,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对它有全部经验,它在任何个体的经验中必然是缺场的。因此,基于个体感性经验的叙事也不可能对这个总体性历史做直接的陈述,而只能成为后者的比喻、象征和寓言——

在此我要提出另一概念,它对我的论点而言具有基础性,我称之为“比喻的游戏”。这本质上是一个寓言性概念,它假定下述情形显而易见,这些新的

重大的全球性现实巨大无比,任何个别主体和意识都接触不到……。这些基本现实最终似乎不能再现,或用阿尔都塞的表述,十分类似缺场原因的东西,这些东西从未曾被感觉在场。然而这个缺场的原因可以通过歪曲和象征的方式表达自己,从而显示自己的轮廓。(*Cognitive Mapping* 350)

从詹姆逊的逻辑来看,这似乎是无懈可击的。任何个体都无法获得这种在空间上无比巨大的历史进程的完整感知和经验,因此,任何个体也无法完整地把握这个巨大空间中发生和展开的历史,历史对于任何个体的经验和认知都是“缺场”的。人们只能依靠理性和科学来把握这个“缺场的历史”。这当然会使人们想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思想:绝对精神主导着人类历史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但生活于任何具体时空的个体却无法感受和了解这个总体性力量。詹姆逊的这个观点可能引发许多创新性洞见,也会引发许多新的疑问。例如,既然个人经验感知完全不可能把握这种总体性历史,那么人类如何证明这种总体性力量的存在呢?又如,从文学艺术角度讲,作为感性认知方式之一的文学艺术如何表达它?要知道詹姆逊的叙事政治阐释模式中,最高的一个圈层就是对具体叙事文本中这种总体性历史(生产方式)的阐释。詹姆逊的解决方法是,叙事活动不可能直接表达这种总体历史,它也不可能提供关于这种总体历史的再现性图景,它只能通过比喻、象征、寓言的方式指向这个总体性历史。因此,在这个层面上,叙事提供的是关于总体性历史的象征和寓言。詹姆逊的这个观点建立在这样一个潜在的认知基础上,文学艺术与历史总体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一种类比思维建立,而不是以科学认知的思维方式体现。我们知道,象征也罢,寓言也罢,都是通过局部指向整体、有限指向无限、个别指向普遍、具体指向抽象、已知指向未知的表达方式。正是基于这种象征论、寓言论的理论框架,詹姆逊在他选择的所有文学现象、所有作家艺术家的具体艺术作品中,都能轻松地发现整体性历史的存在。其中,曾被中国学术界广泛引用的所谓文学的“民族寓言论”就是典型的例证之一。

但詹姆逊既然认为总体性历史尤其是晚期资

本主义的总体性历史巨大复杂到任何人经验不到,所有个体的经验相对于这个总体性历史而言都是不真实的,这个总体性历史只能通过科学认知才能被理性地把握,那么这在逻辑上就存在一个问题:作家艺术家作为个体肯定也是无法从经验中感受到总体性历史的,他们的经验也一样是不真实的,甚至恰恰是虚假的(如前詹姆逊所说“在这一环境里,我们可以说若个体经验可信,那它就不真实;若一个内容相同的科学或认知模式真实,那它就无法被个体经验所捕捉。”)。而文学艺术创作又是建基于作家艺术家经验之上的,建基于不真实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文学艺术作品又如何可能真实地表达总体性历史呢?或者说他创造的叙事世界如何可能作为总体性历史的合适象征或寓言呢?文学政治阐释又如何可能通过具体文本不真实的经验表达象征性或寓言性指向真实的总体性历史呢?要知道,无论象征还是寓言还是比喻,都建基于本体与象征(寓言、比喻)对象之间的同向性、同构性基础之上。一个象征物(寓言、比喻都一样),只能指向与自己同向同构的对象,绝对不能指向与自己反向反构的对象。因此,如果詹姆逊说相对于总体性历史,个人经验总是不真实的这个结论是对的,那么,通过作家建基于这种经验基础之上的具体文本叙事有效地指向总体性历史就是不可能的,批评家希图将这个叙事图式作为总体性历史的象征、寓言、比喻等,也都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在这种情况下,更合适的是将作家的叙事文本作为一种症候,一种与总体性历史相关但又基于不真实经验的幻想或幻觉对待,而不是作为象征或寓言对待。

不管詹姆逊自己是否意识到,他的象征论、寓言论突出地显示出对于总体性历史神秘化的倾向。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对此前西方文化史上几种著名的阐释体系进行讨论的时候,特别将中世纪神学的四层次阐释体系作为重要对象进行讨论。比较他的关于叙事阐释的三层次模式和中世纪神学的四层次阐释模式,人们很容易发现其中类似的地方,其根本的类似之处,就在于两者都强调具体文本陈述的象征的、比喻的、寓言的功能。神学阐释学的最终指向,就是要通过《圣经》具体文本的语言和故事指向对至高无上的那个终极性神性存在(上帝)的发现和领悟。因为上帝是世界的终极创造者和统摄者,是一切的“一”,

一切关于《圣经》的阐释只有揭示了具体表述与这个“一”的终极性关联才算最终完成。在詹姆斯的叙事政治阐释模式中,这个上帝变成了“总体性历史”,尤其是其中的生产方式,那是一切的“一”,叙事政治阐释最终只有证明所有叙事文本中具体的叙事因素都最终指向这个总体性历史、是这个总体性历史的象征或寓言,才算最终完成。和中世纪神学阐释学一样,詹姆斯的这个阐释模式也存在神秘化特征。

这样,我们发现,詹姆斯在《政治无意识》中以“总体性历史”为阐释主符码完成了对形式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犀利的祛魅工作,但同时,他在悄悄给自己的主符码赋魅。当他用“总体性历史”给形式和审美祛魅的时候,他高瞻远瞩、目光如炬、洞彻一切、犀利无比,但他不自觉地给自己的“总体性历史”符码赋魅的时候,他让人感觉既目光辽阔深邃又令人叹息。因为,他的祛魅工作面临着不可解决的困境,毕竟在这个解神秘化的后现代,人们不相信一切神秘的东西。

三

如果将詹姆斯叙事政治学放到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考察,还会产生一个问题:使用“总体性历史”作为叙事政治阐释的主符码是否合适?

后现代之前,不管什么学派什么学者使用“历史”这个概念,这个概念都必然有这样的一些基础性意涵:有方向性、连续性的时间,在时间过程中发生的众多有内在关联性的事件,这些事件围绕着某些主体为中心发生,这些事件中隐含着某些特殊意义和规律(真理),等等。这意味着,历史是有可以把握的总体性的,而这正是西方传统历史观的共同特征。但后现代学者波林·罗斯诺(Pauline Marie Rosenau)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The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中指出,“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很难对历史抱友好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是逻各斯中心的,是神话、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根源,是一种封闭的方法。历史特许‘这一个或那一个主体为至高无上的中心,为真理和意义的终极起源和记录者,而所有其他的事物必须在历史的那些术语中才能被解释’”(Rosenau 63)。

这种对历史的描述自然带有批判色彩,去除

这种色彩,不难发现它列举的确实是西方传统历史研究中几个基础性的条件和特征。但这些基础性条件和特征在后现代都遇到了挑战。后现代是反牛顿时间观的,他们认为,具有方向性的线性时间观念是压迫性的、用来测量和控制人的活动的东西,它在后现代已经不合适了。后现代学者眼中的时间在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不连贯的、非线性的时间,无法控制,也无法以某种确定的方式置入话语中或讨论中。后现代文化理论强调的是空间、当下、区隔、非关联性、非连续性、非主体性、非意义性。他们认为,“后现代世界意义全无;它是一个虚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理论漂浮于虚空之中,没有任何可供停泊的安全港湾。意义需要深度,一个隐藏的维度,一个看不见的根据,一个稳固的基础;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中,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可见的、外显的、透明的,并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景观展现的是意义已死的符号和冻结了的形式,是对同一事物新的排列和组合”(Best and Kellner 127)。所以,在后现代,那种有一个共同起点、遵循某种共同规律、走向一个共同终点的历史已经终结。在一些后现代理论家看来,人类总体上已经完全摆脱了曾经的生活模式、存在方式。历史的时间性、连续性已经不复存在,意义也不复存在,人类也不是曾经的历史主体,他们是“后历史时代”的人,只生活在永远的现在,当下,并置的空间,即坎内蒂(Canetti)所说的,“在某一确定的时刻,人类已经退出了历史,进入到一种新的后历史存在方式”(Best and Kellner 172)。后现代相当意义上是一个“历史终结”的时代,这个历史的终结不是福山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当成人类最后福地的那种终结,而是更为根本的:历史不复存在,已经被取消。

詹姆斯自己也意识到后现代是取消历史的时代,他在很多地方都说到这一点。例如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他就特别说到,后现代出现了“历史性的危机”,后现代文化是一种“越来越被空间和空间逻辑所主宰的文化”。他最近一次到中国的演讲中,再次谈到后现代社会历史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空间正在消除时间”(《〈资本论〉新解》8),传统的或柏格森意义上的有连续性的时间已经不复存在,这个改变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现代电信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他指出,在后现代,“就主体性和个人经验而言,[……]我们

对时间的经验正被替换为对空间的经验”(《《资本论》新解》8)。时间已经被空间所统摄,导致这个空间霸权的原因,在詹姆斯看来,就是全球化导致的世界市场和信息技术的出现,这种信息技术的出现与时间的消失和空间的强化具有关键的作用。在电脑化时代,空间的距离被翻译为实际存在时间的共时性,也就是说,空间正在消除时间。对此,詹姆斯说:

我将这称之为时间性的终结,一切终止于身体和此刻。值得寻找的只是一个强化的现在,它的前后时刻都不再存在。我们的历史观也受到影响。从前的社会没有一个像我们现在的社会这样,有着如此少的功能性记忆和可怜的历史感。这一切和今天个人主体的转换干系重大。在后现代性第一次萌动中,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宣告了“主体的死亡”。他们看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无法和庞大的体制力量抗衡而日趋衰落,同时也看到这种个人主义体现的是具有占有欲和侵略性的自我,而把这种自我唤起的资本主义竞争如今也已衰落。身体是资产阶级文化在消耗殆尽之前的最后现实,是转变、变化和变异的最后发生地,是主体的昂扬自信的激情消退后残留的一点点心情。(《《资本论》新解》9)

历史所需要的时间性终结了,主体性终结了,意义终结了,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也就终结了。显然,詹姆斯最近的这个演讲中传达的对于后现代时间、空间和历史问题的感知信息是微妙的,这是否意味着他对自己前期的历史观已经不那么信心满满?如果真是这样,那《政治无意识》中将历史作为叙事政治阐释的主符码的有效性是否也会受到质疑?毫无疑问,执守后现代历史观的学者们不会接受这个阐释符码的有效性,至少是有深度质疑的。

但我们有理由为历史辩护。后现代历史真的终结了吗?这归根到底取决于“历史是什么”的回答。如果历史意味着一种牛顿式的线性时间、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体、基督教神学式的起点到终点的圆满运动、唯一真理作为终极性意义的统摄,

等等,那这样的历史在后现代确实可能终结了。但我们也可以说这样的历史除了在历史哲学家的想象中存在,在现实中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历史从来并非如此。再说,后现代就没有历史吗?就不需要历史吗?人和人类难道真的只是一个当下性空间存在,除了当下就什么也没有吗?这肯定是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人类本性的。动物对自己个体和群类的历史与过程没有意识也没有兴趣,它们只生活在当下。而人类恰恰是具有反思性的动物,是一个对于自己个体和类群生活过程、生活历史有意识也有兴趣回味反思的生灵,人类是既生活在当下、现在,生活在空间,也生活在过去和未来,生活在时间,生活在历史之中的动物,这几乎是对人类具有本质规定性的东西。后现代所有否定历史必要性和可能性学者的那些见解,在表达着对于历史特殊洞见的同时,其言论也是过分夸张和偏激的。这是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时代,是一个高喊着终结一切的时代,是一个文化断裂和急剧转型的时代。回头看过去的历史,人类也曾经经历过若干次文化断裂和急剧转型的时代(如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代、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时代、从前现代主义到现代主义时代、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时代等),在这些转型的过程中,那些激进地推动文化与社会转型的人们都曾经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宣称过许多事物的终结,但最后当走过这个时代后,发现什么都没有终结,一切还在继续,只是以很不相同的方式继续。高喊终结历史的后现代学者自己面临的一个悖论是,他们一直生活于历史之中,时间之中。他们想拒绝的过去不管他们是否愿意都连接着现在和未来,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强调的当下最后都会变成历史的过去并指向未来,他们钟爱的“空间”总是时间的展开和延续形式,一如他们想遗忘或拒绝的“时间”实际上每分每秒地体现在他们空间的移动、转换和改变之中。所以,终结时间、终结历史是不可能的事情,能终结的,是某种时间观、历史观、历史理论,以及按照这种历史观组织的历史。

所以,我们可以为詹姆斯辩护:历史并未终结,历史仍然可能,从历史角度阐释叙事政治问题以及整个文化问题,仍然是可能和必要的,詹姆斯从历史角度阐释叙事形式和其他后现代文化的政治性是能成立的。

四

但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历史是否存在,而在于怎样的历史是否存在?正是在这里,詹姆逊的历史观在后现代会遇到最严峻的挑战。

众所周知,詹姆逊的历史观是建立在黑格尔逻辑主义和卢卡契式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基础之上的,这两种理论都强调历史具有整体性、总体性。以此认识为基础,詹姆逊改造了现代多种历史理论尤其是阿尔都塞的结构历史观,并建立了自己具有总体性的历史阐释理论。在他的历史阐释理论中,世界与历史是有总体性的,无论从共时性还是历时性角度都是如此。正是这种历史观与上述后现代历史观存在根本的冲突,所以,詹姆逊尽管在后现代声名赫赫,但他的历史观在后现代著名学者那里认同者寥寥。

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的主符码是什么?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众所周知:建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人类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所有活动之总和,其历史阐释的主符码就是“经济基础”或“阶级斗争”。但这种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在詹姆逊的后现代语境中已被广为诟病,或者按照詹姆逊的说法是“臭名昭著”。20世纪初期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了观念(文化)决定论的历史观,20世纪中后期阿尔都塞提出了“多元决定论”的历史观,福柯的研究则表现出权力中心论(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政治中心论)的历史观。所有这些历史观都在明里暗里否定黑格尔逻辑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在这种语境中,詹姆逊1979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主导符码”不是“经济基础”而是“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一个主导符码(a master code),但是这个主导符码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或者是狭义上的经济学和生产论,或者是作为局部事态或事件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相当不同的范畴,即‘生产方式’本身”(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149)。

以“生产方式”作为历史阐释的主符码,这并不是詹姆逊的首创,而是来自阿尔都塞。在1982年出版的《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指出,“生产方式”这个主符码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已经存

在,但到阿尔都塞学派那里对这个概念给予了革命性的改造,并赋予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很不一样的地位(在传统马克思那里,生产方式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在阿尔都塞那里,生产方式是覆盖所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范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人类历史就是不同生产方式的交替和并存构成的历史,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和特定生产方式有根本的联系,因此,历史是有总体性的,保证这个总体性的最终框架就是生产方式,这才是詹姆逊的整体历史观。

但这个总体性历史观在后现代真是不合时宜。如果说后现代还有自己的历史观的话,那这种历史观是一种小型历史观、多元历史观和多维历史观。这些历史观都拒绝接受一个认知:历史具有总体性。而总体性正是关于历史宏大叙事的一个基本前提:历史具有总体性,具有内在的关联,人类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最根本的主导性力量或元素起着根本的作用,正是这个主导性元素保证了历史的统一性、总体性和内在相关性。古代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式”、中世纪神学的“上帝”、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尼采的“权力意志”、韦伯的“理性化”等,都是保证他们各自历史总体性的关键元素。但在詹姆逊写作《政治无意识》的上世纪80年代,这些总体性历史理论都成为被解构、被颠覆、被悬置、被抛弃的“过时”理论。后现代如果还有历史观,那是一种没有总体性、关联性、内在统一性的历史观,空间、区隔、断裂、并置、共时、碎片、小型,这是后现代各种理论的关键词。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通过对后现代知识构成的考察,明确地宣布各种关于人类社会的“宏大叙事”已经衰落,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小型叙事”的时代。他所说的“宏大叙事”,就包括了詹姆逊理论来源的黑格尔的历史叙事和卢卡契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利奥塔明确将它们作为当代几种“宏大叙事”理论之一)。他所说的小型叙事,指的是从某一个限定的角度对某一个特定领域和部类进行的知识建构,这种知识不试图包罗万象,不试图成为终极性真理,不追求总体性把握。成为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奠基人之一的迈克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了对社会进行知识考古学研究的模式,他强调指出“起源、连续性、总体化,这些都是思想史的重大主题,

[……]考古学的描述却恰恰是对思想史的摒弃，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一种系统的拒绝”(138)。

这个对总体性拒绝的姿态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共同的态度。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对总体性历史观的拒绝也代不乏人。在詹姆逊之前就有法兰克福学派宗师阿多诺。在上世纪30-60年代，阿多诺就坚决拒绝詹姆逊十分欣赏的卢卡契的总体性历史观，他认为，卢卡契所主张的历史的整体性、普遍性、同一性是虚假的，分裂、破碎、差异、个别、非同一性才是真实的。他甚至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强调这种总体性，就是在肯定资本主义现实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反动的。因为资本主义就是用这种虚假的同一性、整体性、普遍性压抑个别性、差异性和破碎性的真实存在。否定性是阿尔多诺对待现实的基本理论立场，他的否定理论并不提出一个具有总体性的历史理论和人类未来的乌托邦图景，他只是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否定的合法性。因为现实是不合理的，所以针对它的否定和批判才是革命的，这其实是在有意回避对历史与社会的总体性判断。而到80年代以后，在西方强调和承认社会与历史具有总体性、且这种总体性的终极保证就是生产方式的学者实在寥若晨星。因此，詹姆逊的历史观在后现代是孤独的。

但詹姆逊完全错了吗？应该不是。无论如何，追求对历史的总体性把握，这确实是人类普遍的渴望。因为人类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历史的无限性而否定对总体性历史把握的必要性，这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但这个立场表现出对人类最深刻本性的无知，人类超越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满足于只生活在当下，感知当下，还追求了解和把握人类个体和群体过去、现在和未来。不仅人类对自己的历史如此，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浩瀚宇宙也是如此。即使与无限宇宙相比是渺小到无穷小的人类，仍然持之以恒、雄心勃勃地追求了解这个无限宇宙的起源、历史和未来，科学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学者如牛顿、爱因斯坦、霍金等的名字，都和这一事业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没有理由嘲笑和否定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工作，我们就更没有理由拒绝和否定类似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望整体性把握人类历史的工作。我们应该做的是检讨他们这些工作的成果是否合适，并且探讨合适的把握是怎样的。

五

我提出的问题不是后现代式的，而是极其传统的（或者说超后现代的）：一个时年有限的生命，如何能把握无限的总体性历史呢？这当然是一个从古到今都让无数哲人一直感到艰难的问题（如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每一个特定时空中的人类群体或个体，都在追求对自己历史的全面把握和了解，并且提出自己的历史总体观，但跳出他们所处的时空视野，我们将发现，已有任何一种关于总体历史的认知都不是唯一的，都只能是“我的总体历史”，一如海德格尔的“此在之在”。这个命题标示出了总体历史观的价值，也标示出了其限定性所在。其价值在于，任何人有关历史的认知和判断都显在或潜在地与自己的总体历史观相关，没有这种总体历史观，他就无法对具体历史作出合适感知和判断（“此在之在”的建构总是以对“存在”的确认为前提的）；但另一方面，他的这种总体性历史（“此在之在”）也只是他自己的，既不可替代，也必定不具有普遍有效性。超越了他的时空限定，人们将很清楚地看到，他的总体性历史其实最后仍然不是总体历史，而只是“小型历史”。

詹姆逊面临的理论困境是，既然所有人都无法感知和把握，又如何证明那个总体性历史存在呢？詹姆逊说历史总体性只能依赖理性和科学来把握，但真正将理性强调到极致的也许是19世纪的黑格尔哲学，然后他的历史观却恰恰被20世纪大多数哲学家所抛弃。理性和科学如果真能全面把握人类历史的总体性，那么这个工作应该早就完成了，不至于到现在还在反复讨论。

我们也许可以借助中西哲人已有智慧吸纳詹姆逊“总体性历史观”的洞见而解决他面临的困难。就西方而言，海德格尔的阐释模式应该是有启发性的。如前所述，他的哲学也预设了一个一切的“一”的终极性“存在”（Sein），但他哲学的重心却是“此在”（Dasein），是“此在”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建构的“此在之在”（Da-sein）。在海德格尔那里，所有的“此在之在”都和终极性“存在”相关联，都分有存在，但都不可能是存在的全部，它们都只能是“存在”万千可能的一种。同时任何一个“此在之在”既不追求也不可能象样板一

样成为终极性“存在”的完整象征或寓言,因为所有的“此在之在”都是唯一而不可替代的,互相之间差异万千,各有其存在价值。海德格尔的哲学模式,较好地解决了个别与整体的关系,他的哲学意味着,那个终极性“存在”就在每一个“此在”每一天的具体生活世界中。

中国古代老庄哲学也表达了类似的认知。老子《道德经》也预设了一个世界的终极性存在“道”,同时他否定了个体通过五官感觉、语言、思辨掌握这个万全万有终极“大道”的可能,因而,“道”是极其神秘的终极性存在。但庄子的哲学弥补了他的缺憾,庄子恰恰是强调“道”在世界万物之中,他的名言“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砾,在屎溺。每况愈下,盖以道无乎不在也。”^③就是这个思想的典型表达。庄子的意思是那个终极性的、绝对性的“道”在万物之中,在每一个人每天面对的、经验的、经历的一切具体场景、过程、对象里面。因此,个体通过对日常具体生活世界的经验、体察、领悟就能体道悟道。这样,世界的终极性真理与个体日常生活经验就获得了统一。这一哲学思想对中国后世哲学和美学以及文学艺术影响至深。

当詹姆逊将总体性历史作为一切历史叙事的终极“底牌”,同时又说在任何具体的叙事文本中,这个历史总是“缺场的原因”,其实已经暗含了与上述海德格尔和庄子类似的思想结构,只是他与他们的指向是相反的。就詹姆逊的问题而言,也许可以这样解决:总体性历史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但这个总体性历史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彻底了解和把握的。但任何个体的经验都是在特定历史环境和过程中获得的,都是这个总体性历史的一部分,都分有总体性历史的某些因素或特征(而不是像詹姆逊那样认为个人经验对于总体历史都是不真实的),因此,也都应该能从中倾听到总体性历史的信息和脚步。这样,基于个体经验的叙事就有可能成为总体性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总体性历史的象征或寓言,从中人们才可能倾听到总体性历史的声音。詹姆逊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这样的处理获得部分的解决?

即使如此,詹姆逊理论存在的神秘化倾向也无法完全消除。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是西方所有对历史追求宏大叙事的哲学家都存在的问题,当他们将世界万有最后都统摄于一个唯一

的元素之内时,都不能不对这个终极性因素赋魅,使其神秘化,因为在个体经验和科学理性可以考察的视域,是很难找到这个一切的“一”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宏大叙事一定没有价值,人类要获得对于自己生活世界的统一性把握和认知,就一定需要在一个以某种终极性要素统摄一切的构架中进行和完成。即使面对更浩瀚无际的宇宙,科学家也在追求建构一个关于它起源和归宿的宇宙模型,何况人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呢?因此这是一种两难困境,它是每一个执守宏大叙事的理论家都必须面对的。

注释[Notes]

- ① 未刊稿。
 ② 本文中“元历史”(Metahistory)这个概念在这里与海登·怀特的使用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怀特理论中,“元历史”(Metahistory)这个概念广义上指历史哲学,尤指“思辨的历史哲学”(因此,Metahistory在怀特那里准确的中译应该是“元史学”)。本文中“元历史”的本意指的是一切历史叙事后面那个曾经真实发生和存在的终极历史底本。
 ③ 《庄子》原文为问答形式,此处省略其问,仅将其回答部分辑录一起而成。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74-75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est, Steven, and Douglas Kellner.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1.
-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 Jameson, Fredric. "Cognitive Mapping."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 .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 - 1986*.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 弗雷德星克·杰姆逊《〈资本论〉新解》,朱羽,蒋晖译,《现代中文学刊》,1(2013):4-9.
- ["Representing Capital." Trans. Zhu Yu and Jiang Hui.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1(2013): 4-9.]
- Rosenau, Pauline Marie.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责任编辑:王嘉军)